

企业家创业行为研究新进展^{*}

王春超 冯大威

内容提要:企业家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就业规模扩大、创新精神培育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尽管学术界很早就意识到企业家创业活动的重要性,但受限于不同学科领域学者对企业家创业活动认识存在的差异及数据可得性,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拓展。本文探索相关文献的发展脉络,企业家创业行为的最新文献及其特点,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以便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研究和探索思路。

关键词:企业家 创业 创业行为

企业家创业活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企业家创业行为则是研究创业活动的应有之义。本文围绕企业家创业行为,从企业家的定义与度量、创业行为选择机制、创业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创业行为的经济价值及创业行为未来研究方向等五个方面阐述重要文献发展和最新进展。

一、企业家的定义与度量

(一)企业家的定义

法国经济学家 Cantillon(1755)较早引入了企业家的概念,将“按照固定价格购买和按照不确定价格出售”的风险承担者称为企业家。此后,来自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研究角度对企业家的概念进行了研究。企业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学界对企业家的定义、功能及范围的理解没有一致结论,但他们都肯定了企业家是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具备创新和冒险精神,通过识别创业机会,并投入可利用创业资源,实现潜在获利机会。

(二)企业家的度量

定量分析中,以往研究在界定企业家的范围时具有不同的看法。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的优化、新的管理组织方式的产生都会影响着企业家的界定范围。针对一国或地区创业活动水平的衡量,学界有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ILO)的自我雇佣比率、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的新企业创业率以及世界银行的新企业登记数量。但上述指标在定量分析应用中存在一定局限。企业家创业行为的研究包括三个层面:个体、企业及国家(地区)。其中,个体层面是研究的焦点,如何识别个体的企业家身份是研究的重点,而上述三种指标适用于国家(地区)层面。此外,上述三个指标涉及全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考虑到国家间统计口径的差异,在统计创业活动水平时只考虑正规公司,而不考虑非正规公司(Naudé, 2013)。这就易于造成对创业活动水平的低估,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包括家庭企业、社区企业等形态的非正规公司是比较常见的创业形态。

针对个体层面企业家创业行为的定量分析,目前学界普遍采用自我雇佣指标识别个体在某一时刻是否是企业家(Evans & Jovanovic, 1989a; Blanchflower & Oswald, 1998)。该识别方法依据 Cantillon(1755)最早对企业家的定义,“企业家是从事独立商业活动的人”,并且在人口调查数据中,针对个体就业身份的调查普遍包括自我雇佣选项。选取自我雇佣指标识别创业者身份虽然比较容易实现,但定量分析中应用此指标研究企业家创业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创业行为的经济价值等问题时,经常会得到不符合现实的结论。因为自我雇佣无法综合

^{*} 王春超、冯大威,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暨南大学中国经济发展与创新战略研究中心,邮政编码:510632,电子邮箱:twangcc@jnu.edu.cn, dawei19891124@qq.com。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73104)、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4YJA79005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5JNYH005)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反映创业活动的创新性、开拓性和冒险性。基于此,较多学者根据研究的目的和数据的可得性,提出了不同的处理方法。有研究通过施加约束条件来强化自我雇佣者的企业家精神,如 Jensen et al(2014)和 Djankov et al(2006)分别将雇员数量为 1 个及 6 个以上的自我雇佣者界定为企业家,雇员数量可以把纯粹的自我雇佣者和私营企业主区分开。Li & Wu (2014)只将工作单位登记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自我雇佣者定义为企业家。也有研究考虑到企业家创业活动巨大的内部差异而将其进行细分,如 Fritsch et al(2014)根据是否有雇员将创业活动分为无雇员和有雇员创业活动。Levine & Rubinstein (2013)根据是否满足有限责任制及独立合法经营主体的条件将创业活动分为公司型和非公司型创业活动。考虑到创业经验在个体创业选择及生产经营中发挥的作用,有研究根据创业经历将创业者分为初次创业者和连续创业者(Lafontaine, 2016)。最为普遍的划分方法是依据创业动机将创业者划分为生存型和机会型创业者(Block & Wagner, 2010; Tipu, 2016)。如果为了追求更高效用而主动选择创业活动,则定义为机会型创业者,如果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而不得不选择创业活动,则定义为生存型创业者。

此外,也有研究从公司或地区层面对企业家创业行为进行研究,常用的代理指标为自我雇佣比率(Liang et al, 2014; Arin et al, 2015)、新成立的公司数量(Ghani et al, 2014a)、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比率(Caves, 1998)等。

二、企业家创业行为的选择机制分析

一般认为,创业行为是个体面临多种就业类型时理性选择的结果。假设个体只能同时从事一种职业^①,理性个体通过相对效用的比较选择能够带来最高效用水平的就业方式。由于个体层面的效用需要同时考虑货币性收入和非货币性效用,根据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可将企业家创业选择机制归纳为以下两种:高收入特性和非货币性效用。

(一)高收入特性

理性个体基于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创业选择,个体层面的效用需要同时考虑货币性收入和非货币性效用,由于效用函数的设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一般通过构建收入函数来分析比较不同条件下的创业选择行为(Evans & Jovanovic, 1989b; Banerjee & Newman, 1993; Nguimkeu, 2014),个体倾向于选择

具有最高收入回报的就业类型。简化起见,常用的基准职业选择模型框架只包括两部门:工资性工作和创业活动,不考虑其他类型的就业形式,如失业或者退出劳动力市场。^②

工资性工作和创业活动的收入函数分别设定如下:

工资性工作收入函数 π^w 由劳动力市场外生给定,恒等于常数 w ^③:

$$\pi^w = w$$

企业家创业活动生产函数包括两种投入要素,企业家能力及资本:

$$y = \theta k^\alpha \epsilon$$

考虑生产要素成本,创业活动的净收入^④为:

$$\theta k^\alpha - rk$$

其中, θ 为企业家能力; k 为资本投入; α 为资本产出弹性,且 $0 < \alpha < 1$; $\epsilon \sim N(1, \sigma_\epsilon^2)$,为产出干扰项,且独立于 θ 和 k ; r 为 1 加上市场利率。

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个体面临着信贷约束。个体在资本市场上能够获得的最大贷款额不超过其初始财富的固定倍数(Evans & Jovanovic, 1989b),因此假定在资本市场获取外部贷款的最高额度为 $(\lambda - 1)z$, $\lambda \geq 1$ 。所以个体在创业活动中利用自有资本和外部资本可以投入的最大资本量为 λz ,结合预算约束,个体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最优化问题如下:

$$\max\{\theta k^\alpha - rk\}$$

$$\text{s. t. } 0 \leq k \leq \lambda z$$

给定预算约束及收入最大化函数,假设个体知晓其企业家能力 θ 及初始财富 z ,就可以推断从事创业活动所能获得的最高收入,进而通过与外生给定的工资性工作收入进行比较,选择能够带来较高收入回报的就业活动,完成职业选择。

基于“高收入特性”创业选择机制的两部门职业选择模型成为此后企业家创业选择行为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坚持“高收入特性”创业选择机制的前提下,有研究在应用理论模型解释个体创业选择行为时进行了拓展,最常见的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对创业活动进行细分,构造三部门的职业选择模型,如 Salas-Fumás et al(2014)则将就业群体细分为工资获得者、有雇员自我雇佣者和无雇员自我雇佣者。三部门职业选择模型在解释个体创业选择行为时更符合现实。

(二)非货币性效用

在“高收入特性”创业选择机制下,理性个体基

于不同职业相对收入的比较选择创业与否。但上述模型假设条件存在不足：一方面现实中相对于工资性工作，创业活动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内部收入差异相对于工资性工作更大(Hamilton, 2000; Astebro & Chen, 2014)，创业活动的高收入特性可能被其风险贴水所抵消；另一方面，相对工资性工作，“自己当老板”的非货币性福利也不容忽视。创业活动具有更好的工作独立性和劳动自由度、更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技能和追求自己的想法以及更可靠的工作保障(Benz & Frey, 2008)。在有关创业选择与收入的实证研究中，虽然更多的实证研究发现创业活动不会提高个体的货币性收入(Hartog et al, 2010; Hyytinen et al, 2013; Astebro & Chen, 2014)，但对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却有明显的正向影响(Binder & Coad, 2013; Millán et al, 2013)。基于以上两点考虑，“高收入特性”就无法完全解释个体创业选择行为，收入不确定性和非货币性福利在个体做出创业选择时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在分析个体创业行为时，有研究在上述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如建立能够同时考虑收入水平、收入不确定性和非货币性福利的效用函数(Torrini, 2005; Bianchi & Bobba, 2013)，用相对人力资本代替相对收入识别个体创业选择行为(Jacobs, 2008)等。已有文献将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机制归纳为两种：高收入特性和非货币性效用。但这两种机制都是以效用最大化为分析框架，解释理性个体主动选择的过程。这两种机制能够解释一般的创业现象，但对一些特殊形态的创业现象缺乏解释力。如社会创业(Choi & Majumdar, 2013; Rey-Martía, 2016)，个体需要同时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而非个体效用最大化。在发展中国家背景下，非正式自我雇佣活动是最常见的创业类型，并且在过去几十年间增长较快(Falco & Haywood, 2016)。这部分创业活动通常是缺乏就业机会的被动选择，被动创业也不适用于前面两种机制。因此，有关企业家创业选择行为机制的讨论需要进一步的探讨、拓展和完善。

三、企业家创业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

理性个体基于不同就业类型能够获得的效用水平大小做出选择。所有可能影响工资性工作和创业活动效用函数的因素都可能会影响个体创业选择行为，接下来对多个维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性的阐述。已有对影响企业家创业行为因素的研究

集中在三个层面：个体、社会以及宏观层面。有文献研究单个层面因素的影响，也有文献综合考虑多个层面因素的影响。

(一)个体层面

个体层面因素回答了谁能成为企业家的问题，人口特征、心理特征、家庭背景等因素是研究的焦点，本文重点讨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心理特征三个在研究中关注较多的因素。

1. 人力资本。在教育水平方面，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有助于其识别潜在创业机会及获取外部创业资源。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更有可能获取稳定的、待遇高的工资性工作，在实施创业行为时相较于普通人要承担更高的机会成本从而抑制了他们的创业动机(Berkowitz & De-Jong, 2005)。实证分析中，只考虑两者之间的线性关系，有研究发现教育对创业选择的影响为正(Dawson et al, 2013)，但也有研究发现影响为负或不存在显著影响(Van der Sluis et al, 2008)。但越来越多的定量分析开始考虑教育对创业选择的非线性影响，发现两者之间存在U型关系(Blanchflower, 2000; Poschke, 2013)。此外，也有文献对其他人力资本特征展开了研究，如培训(Sánchez, 2013)、工作经验(Lazear, 2005)、身体状况(Rietveld, 2016)等。

2. 物质资本。创业活动需要资本投入，定量分析中通常选用家庭财富作为个体可利用物质资本资源的代理指标。家庭财富不但可以直接投入创业活动，还可以在资本市场上作为抵押品获取更多外部贷款。较多研究发现，家庭财富和个体创业选择是正相关的(Evans & Jovanovic, 1989a)。但在研究家庭财富对个体创业行为影响时，需要考虑内生性问题。因为一方面个体可以在从事创业活动的同时，通过生产经营活动积累家庭财富。另一方面，如果个体直接通过继承家族企业成为企业家的话也会带来内生性问题。基于此，较多文献开始考虑由于偶然发生的外生冲击带来的家庭财富的变化对个体创业选择的影响。此种方法背后的原理是家庭财富的变化是外生的，因此不存在内生性问题。既有研究对影响家庭财富的外生事件的选择也存在较大差异，常见的有：赠予或遗产继承、房产增值、彩票奖金等(Blanchflower & Oswald, 1998; Hurst & Lusardi, 2004; Schmalz et al, 2013; Harding & Rosenthal, 2013; Kerr et al, 2015)。也有研究利用政府项目或者房产改革等外生事件形成的“准自然

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资本对个体创业选择的影响(Bianchi & Bobba, 2013; Giné & Mansuri, 2014; Blattman et al, 2014)。

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家庭财富和创业选择依旧是正相关的,从而验证了创业活动中资本约束的存在。但是,家庭财富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个体在创业活动中可以获得的资本量,还可能通过其他渠道影响个体创业选择。经济状况越好,个体也有更高的风险容忍度(Bianchi & Bobba, 2013)以及更强烈的自己当老板的渴望(Hurst & Lusardi, 2004),以上心理特征的变化也会提高个体创业选择倾向。因此,即使不存在资本约束,以上两种机制也可能导致家庭财富跟创业选择正相关。但 Jensen et al (2015)利用丹麦的房产抵押贷款改革检验了创业过程中是否存在资本约束,该外生冲击在不影响家庭财富的条件下可以提高个体在资本市场上获取外部抵押贷款的能力,研究结论支持了资本约束的存在及其对创业行为的影响。

3. 心理特征。相对于工资性工作,创业活动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风险偏好也经常用来解释个体创业选择行为差异。基于相关理论分析,具有较低风险规避度的个体更倾向于创业。实证分析中,研究风险偏好对个体创业行为影响时,风险偏好代理指标一般选取自个体层面的心理调查数据(Djankov et al, 2006; Skriabikova et al, 2014),但主观报告的心理特征往往存在衡量偏误,影响估计结果。有研究基于个体所表现出来的经济行为衡量其风险偏好,如个体投资数据(Hvide & Panos, 2014)、过去几年收入的方差(Yueh, 2009)等。较多研究证实风险偏好对创业选择有正向的影响(Hvide & Panos, 2014; Skriabikova et al, 2014)。但也有研究发现,风险偏好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是非线性的。Hu(2014)利用中国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风险中性的个体更容易选择创业活动,而规避风险和偏好风险的个体都更容易成为工资性工作者。此外,还有一些心理特征也是影响个体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如过度自信(Koellinger et al, 2007)、追求独立的渴望(Croson & Minniti, 2012)、害怕失败(Cacciottia et al, 2016)等。

以上内容重点讨论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心理特征三个个体层面的因素。此外,也有文献对其他因素展开了研究,如年龄(Caliendo et al, 2011)、性别(Koellinger et al, 2013)、婚姻状况(Poschke, 2013; Li & Wu, 2014)、政治身份(Yueh, 2009)等。

(二)社会层面

社会层面因素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社会网络,其可以通过提供信息与资源的支持,帮助个体更好地识别创业机会及获取创业资源。社会网络在创业选择及创业表现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1. 父母的影响。在对创业活动的研究中,父母对孩子创业活动的影响是研究的热点,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传导机制:一是直接继承家族企业;二是提供创业所需资本资源;三是经商能力、知识、价值观以及经商的态度等人力资本的传递;四是榜样效应。较多研究发现父母曾经是企业家会显著提高子女的个体创业倾向(Lindquist et al, 2015)。但对影响机制的检验却存在差异。也有研究探讨了祖父母对孙代的影响,Andersson & Hammarstedt(2010)利用瑞典本地和移民男性数据研究发现,有创业经历的父母对孩子创业活动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但有创业经历的祖父母只对移民个体的影响为正,对本地个体则没有显著影响。

2. 配偶的影响。社会层面因素中,另一个对个体创业选择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是配偶。配偶同为企业家的家庭数量比较多(Blanchflower & Meyer, 1994)。配偶可以通过三个渠道正向影响个体的创业行为:一是选择性婚配,个体在择偶过程中,倾向于选择具有相似教育背景、年龄、工作偏好的配偶(Andersson & Hammarstedt, 2010);二是榜样效应,个体的职业选择会受到配偶工作表现的影响;三是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共享理论(Caputo & Dolinsky, 1998),夫妻可以共享家庭拥有的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资源。较多实证检验发现,配偶的影响显著为正(Parker, 2008; Andersson & Hammarstedt, 2010; Dohmen et al, 2012),但对影响机制的检验同样没有一致结论。另一方面,配偶对个体创业选择也可能存在负向影响,由于创业活动面临着较高不确定性,夫妻之间很可能选择不同的就业方式,从而分散收入风险(Parker, 2008)。

父母和配偶以外,还有文献研究朋友、同事、亲戚对个体创业选择的影响(Djankov et al, 2006; Lafuente et al, 2007; Field et al, 2015)。

(三)宏观层面

个体和社会层面因素主要用来理解微观个体创业选择行为。由于创业活动水平在国家或地区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较多文献从不同角度解释国家或地区间创业活动水平的差异(Kshetri & Dhoklakia, 2011; Liang et al, 2014),考虑的因素包括外

部环境、制度和文化等。研究宏观层面影响因素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和文化环境更容易培养企业家群体。

1. 外部环境。人均 GDP 方面,根据 Lucas (1978)提出的理论模型,用人均 GDP 作为人均资本的代理指标,随着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创业活动相对于工资性工作的回报率会下降。因此人均 GDP 越高,创业活动水平越低。较多实证研究证实人均 GDP 与地区创业活动水平负相关(Torrini, 2005; Arin et al, 2015),因此在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创业活动水平普遍较低。但另一方面,人均 GDP 也会给潜在创业者提供市场需求刺激,从而促进创业活动。

失业率方面,高失业率一方面会通过减少工资性工作就业机会,迫使个体选择创业活动。另一方面,也会通过降低消费需求,引起消费市场萎缩,抑制创业活动。实证研究中,有研究发现两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Evans & Leighton, 1990),但也有研究发现两者是负相关关系(Blanchflower, 2000)。此外,外部环境影响因素中,创业氛围(Guiso et al, 2015)、国有部门比例(Torrini, 2005)、人口规模与人口密度(Armington & Acs, 2002)、基础设施(Ghani et al, 2014a)等也都是研究的重点。

2. 制度。近年来,制度因素被越来越多地用来解释国家间或地区间创业活动水平的差异,制度改革也被政府视为培育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举措。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存在诸多不利于培育企业家精神的制度障碍,加快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以刺激企业家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税收制度方面,相对于工资性工作,创业活动避税的可能性更高,因此税率的提高将会迫使更多有逃税动机的个体选择创业活动。较多实证研究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证实(Asoni & Sanandaji, 2014)。然而,如果创业活动收入对个人努力程度的弹性相比于工资性工作更大,税率提高对创业者收入的负向影响将高于工资获得者。这种负向影响可能超过成功避税获得的正向影响。因此,基于理论的分析并不能判断税率对创业活动水平的影响。事实上,也有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Fölster, 2002)。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一般认为高税率会抑制创业活动。

已有研究大都以税率作为税收制度的代理指标,Torrini(2005)综合考虑了税率和税法执行情

况,对 OECD 国家创业活动水平的研究发现,税率鼓励还是抑制创业活动取决于政府对逃税行为的态度。Asoni & Sanandaji(2014)考虑了不同类型税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比例税对创业活动水平没有影响,但累进税会显著提高创业水平。

此外,在影响创业行为的其他制度性因素中,社会治安(Rosenthal & Ross, 2010)、私有财产保护制度(Liang et al, 2014)等也都是实证研究中重点考虑的因素。

3. 文化。文化也是解释地区创业活动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文化是特定群体或社会的潜在的系统价值观,影响着成员的行为特征。赵向阳等(2012)基于“全球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有效性”(Glob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al Effectiveness, 简称 GLOBE)和“全球创业观察”(GEM)两个国际性数据库从国家文化的视角来解释不同国家创业活动活跃程度的差异。Mueller & Thomas(2001)研究发现,创业活动在具有较低不确定性规避态度的文化环境中更活跃。Lee & Peterson(2001)比较分析了不同的文化环境对企业家创业活动的影响,发现一个鼓励独立思考、重视财富、不循规蹈矩的社会的成员更有可能创业。但 Freytag & Thurik(2006)对欧盟和美国的研究则发现,文化只对创业偏好有影响,但对实际的创业活动没有显著影响。

以上内容从个体、社会和宏观三个层面对企业家创业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重要文献发展和最新进展做了阐述。企业家创业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在不断增多,且重要性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转移。在分析中,我们认为,将多个维度影响因素置于一个系统全面的框架内进行检验将是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四、企业家创业行为的经济价值

理解企业家创业行为的经济价值既是个体理性选择创业活动的重要依据,也是政府实施鼓励创业政策的前提。既有研究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评估企业家创业行为的经济价值,分别体现在对微观个体效用水平的影响以及对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一)企业家创业行为对微观个体效用水平的影响

研究个体创业行为对其效用水平的影响是理解个体创业选择行为动机的关键,也是检验我国当前

经济环境是否有利于创业的重要标准。既有研究中,收入是最常用的衡量个体效用水平的指标。

相对于工资性工作,企业家创业活动面临更高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理论分析一般认为创业活动会带来溢价收入,有研究对这一理论推断提供了支持(Berglann et al, 2011)。然而,更多的实证研究则发现创业活动不会提高个体的货币性收入(Hamilton, 2000; Hyytinen et al, 2013; Astebro & Chen, 2014)。针对创业活动不能提高个体收入的研究结论有两种常见的解释:一种是创业者收入的低报(Feldman & Slemrod, 2007),创业者收入有更多的避税机会。因此研究创业活动收入时需要收入数据进行修正,常用的修正方法是利用食品支出数据(Hurst et al, 2014)。另一种是选取自我雇佣作为创业活动代理指标。

既有研究不仅对创业活动和工资性工作的平均收入水平展开了研究,还对收入的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相对于工资获得者,创业者收入分布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首先,创业者收入分布的方差较大且明显右偏(Hamilton, 2000; Hartog et al, 2010),也就是说,创业者群体收入内部差异更大,且在较高收入水平上分布更多。其次,基于动态数据比较发现,创业者随时间变化的收入曲线更为扁平(Hamilton, 2000),也就是说,创业者刚开始收入水平较低,且随时间增长较慢。

然而,收入只是个体效用函数的一方面,非货币性福利也是个体进行创业决策时重点考虑的因素。因此有学者开始构建同时包含货币性收入和非货币性福利的综合指标,如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Blanchflower & Oswald(1998)利用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个体效用水平的代理指标,对英国的相关研究发现,创业者群体相对于工资获得者群体,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平均水平更高,并且在控制个体、工作等因素后,这种关系依然是明显存在的。Millán et al(2013)将工作满意度区分为由职业类型带来的和由职业安全感带来的,利用欧洲15个国家家庭调查数据检验发现,相对工资性工作,创业活动能带来更高的由职业类型带来的工作满意度,但由职业安全感带来的工作满意度水平较低。

(二)企业家精神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

微观层面企业家创业行为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区域企业家精神。研究企业家精神对国家(地区)

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影响表现在四个方面:经济增长、生产率、就业创造及创新活动。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研究的热点。熊彼特(Schumpeter, 1934)最早提出企业家创业行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活动能够不断鼓励创新活动和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性破坏”思想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Baumol, 1990; Schmitz, 1989)。总体来看,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Audretsch & Keilbach(2004)将这种促进作用归纳为三种效应:一是便利知识外溢;二是提升竞争的激烈程度;三是使特定区域的经济增长更具多样性。

也有研究定量分析了企业家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解释国家(地区)经济增长源泉或国家间(地区间)经济增长率差异。实证分析中使用了自雇比率、新企业产生比率、净进入比率、GEM企业家活动指数等在内的多种企业家精神替代指标。

尽管对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及衡量有不同的理解,但较多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如Hafer(2013)用考夫曼创业活动指数作为企业家精神代理指标,利用2000—2005年美国各州数据检验发现,企业家创业活动的经济增长效应为正。Audretsch et al(2015)使用新成立的公司数量作为代理指标,利用欧洲127个城市1994—2009年度数据研究发现,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均存在显著正向效应,该研究进一步讨论了这种经济增长效应在具有不同市场规模的城市,随时间变动的差异。考虑到在过去30年间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个体和私营经济也发展迅速,有研究关注中国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李宏彬等(2009)研究发现,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均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

此外,也有研究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对其他经济发展指标的影响,如生产率(Andersson et al, 2012)、就业创造(Decker et al, 2014; Glaeser et al, 2015)及创新活动(Huggins & Thompson, 2015)等。

五、企业家创业行为的未来研究方向

以上内容围绕企业家创业行为研究主题,从企业家的定义与度量、创业行为选择机制、影响因素及其经济价值等方面对重要文献进行了论述。基于上

述分析,本文认为未来企业家创业行为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研究对象多样化,并越来越关注特殊重要群体创业行为

在对创业行为的研究对象选择方面,以往文献大都是以劳动力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于一些特殊群体,如移民,包括国际和国内移民(Chen et al, 2014; Fairlie & Lofstrom, 2015)以及返乡农民工(Démurger & Xu, 2011)。相对于普通劳动力,移民有其特殊性,移民经历可以提高个体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从而有助于克服不利的创业初始条件,但移民经历也会使个体损失家乡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在帮助个体更好地识别创业机会及获取创业资源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是因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推动城镇化进程等方面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农民工数量庞大的中国。考虑到女性在心理特征、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面临的就业市场歧视以及更需要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等方面与男性存在较大差异,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集中以女性群体为研究对象(Ghani et al, 2014b; Mel et al, 2014; Valdivia, 2015; Field et al, 2015)。此外,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大学毕业生数量急剧增加,加入创业队伍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大学生创业不仅能够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也可以更好地推动创新活动,所以研究者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创业能力的培养以及鼓励大学生创业政策的效果评估展开了研究(Katz et al, 2016; Premand et al, 2016)。

通过对特殊重要群体创业行为的理解,在金融、税收优惠、培训以及就业大环境等方面对这部分群体提供政策支持,鼓励其选择创业活动,从而在整体上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有效劳动时间,这些将成为未来实证研究的重要方向。

(二)企业家度量的全面性和异质性

定量分析中,企业家的度量是比较有争议的论题,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企业家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往往是从某一方面对企业家进行界定。针对企业家创业行为的定量分析,目前学界普遍采用自我雇佣指标,该指标只能反映企业家从事独立商业活动的特性,而无法反映创业活动的创新性、开拓性和冒险性。但由于缺乏针对企业家群体的代表性调查数据,而在一般涉及就业问题的

人口调查数据中,针对个体就业身份的调查普遍包括自我雇佣选项,所以自我雇佣指标应用比较广泛。这也就导致在研究企业家创业行为影响因素及其经济价值时,由于指标选择不恰当,而得出不符合预期的研究结论。

基于此,在界定企业家范围时,部分研究通过对就业单位类型、雇员数量等方面施加约束来强化企业家精神。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考虑企业家群体的异质性,从不同角度对企业家群体进行细分,如雇员数量、创业动机、创新水平等(Block & Wagner, 2010; Fritsch et al, 2014; Salas-Fumás et al, 2014)。随着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对企业家的分类趋于精细,企业家的内涵也将更为多元和丰富,此方面的研究将值得进一步细化和拓展。

(三)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及国际比较研究

早期涉及企业家创业行为的研究大都以发达国家为研究背景,研究结论很难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检验。发展中国家企业家创业活动在规模及结构上均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非正式自我雇佣活动是发展中国家最常见的创业类型,这部分创业活动通常是缺乏就业机会的被动选择,所获得的是只能维持生计的收入且低于工资性工作收入。发展中国家有关企业家微观调查数据的完善,也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家创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支持。

此外,考虑到企业家创业行为在不同国家间表现出的较大差异,国际比较研究也越来越多,如Torrini(2005)利用国家层面宏观数据从税收制度的角度解释了OECD国家创业活动水平的差异。Gindling & Newhouse(2014)利用家庭层面微观调查数据对74个发展中国家不同类型创业活动水平的差异进行了研究。企业家创业行为国际比较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于各国统计方法的不一致,导致变量统计口径的不一致,进而影响结论的可靠性。而一些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的创业研究数据库的出现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了支撑。比如全球创业观察数据(GEM)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全球创业研究数据,涵盖国家范围较大,调查持续年度比较长。近年来,在研究国家间创业活动水平差异、企业家精神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差异的贡献以及企业家精神水平的动态变化趋势等方面应用比较广泛。

(四)基于纵向追踪数据的动态分析

在考察企业家创业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时,实证研究以截面数据为主。静态分析只能考察某个

时点上个体就业身份的决定因素,而忽略了其初始工作状态及创业活动的持续时间。由工资雇佣转向创业活动和由失业状态转入创业活动的决定因素可能不同,创业活动的经营情况也会直接影响个体选择保持还是放弃创业活动,从而给静态数据带来样本选择问题。此外,静态数据也无法消除个体不可观测异质性,影响实证分析结论。随着纵向数据可得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对创业活动的动态转换进行研究(Levine & Rubinstein, 2013)。因变量不再是在某一时点的就业身份,而是在不同时点就业身份的转换,利用动态数据还可以考察不同因素对企业家创业行为的长期影响(Mel et al, 2014)。创业活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创业过程包括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并判定这个机会的未来收益是否会高于其风险,然后动用已有的及各种可能获取的资源,把这个创业机会付诸实践。不同因素短期内可能只会影响个体的创业动机,只有经过一定时间的资源筹备后,才可能影响创业选择行为。

此外,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利用纵向数据,在研究创业选择行为的同时追踪创业活动的表现,常用的衡量创业表现的指标为雇员的数量、销售额、生存率、收入、资产等(Schmalz et al, 2013; Blattman et al, 2014; Hvide & Panos, 2014),从而为政府培育数量与质量兼备的创业者群体提供依据。

(五) 准自然试验方法的应用

检验影响企业家创业行为的因素时,模型的设定、指标的选取及度量都会影响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导致对诸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没有一致结论。近年来,借助于政策干预等外生冲击形成的准自然实验,识别不同因素对企业家创业行为影响的研究开始增多,主要集中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类因素上。考虑到家庭财富在创业选择行为中的内生性,有研究利用能够提高可利用资本量的“准自然实验”,检验创业选择过程中资本约束的存在(Wang, 2012; Giné & Mansuri, 2014; Blattman et al, 2014)。考虑到人力资本难以全面客观度量,有研究具体考察了能够通过培训和技术帮助提高人力资本的政府政策对创业行为的影响(Michaelides & Benus, 2012; Valdivia, 2015)。也有研究评估了在创业过程中同时满足提供培训和资本援助项目的政策效果(Mel et al, 2014)。运用准自然试验方法,对创业政策的激励效果评估将可能成为未来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方向。

(六) 特殊类型的创业活动

在对企业家创业行为的理论及实证分析中,在研究涵盖所有行业、所有部门的整体创业活动的基础上,一些特殊类型的创业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如社会创业(Choi & Majumdar, 2013; Rey-Martía, 2016)和兼职创业(Petrova, 2012; Block & Landgraf)。在社会创业活动中,企业家创业同时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因此其影响因素及其经济价值均与一般创业活动存在差异。近年来,伴随着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兼职创业现象开始增多。兼职创业相对于全职创业,允许个体同时从事工资性工作和创业活动,在提高收入水平和工作时间灵活性等方面为劳动者提供了机遇,在就业活动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公益创业和兼职创业均不满足传统职业选择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因此,需要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其理论分析框架。

注:

- ①此假设不适用于兼职创业,即允许个体同时从事工资性工作和创业活动。
- ②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也是比较重要的就业形态,进入创业活动前的工作状态对个体创业选择及创业表现都有影响。实证分析中如果不考虑初始就业状态,则可能带来样本选择问题。
- ③Evans & Jovanovic(1989b)所提出两部门职业选择模型中,假定工资性工作收入取决于人力资本和工作经验,但人力资本和工作经验均为外生变量。
- ④个体无法预知干扰项 ϵ 的值,也就无法预知收入的实际值,这里假设个体是风险中性的,干扰项 ϵ 取平均值1。

参考文献:

- Andersson, L. & M. Hammarstedt (2010),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s in immigrant self-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three generation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34(3):261—276.
- Andersson, M. et al(2012),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productivity: Entrepreneurship by type, sector and sequence”,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Public Policy* 1(2):2045—2101.
- Arin, K. P. et al(2015), “Revisiting the 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ship: A Bayesian approa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41(2):607—631.
- Asoni, A. & T. Sanandaji(2014), “Tax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2):101—123.
- Astebro, T. & J. Chen(2014), “The entrepreneurial earnings puzzle: Mismeasurement or real?”,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9(1):88—105.

- Audretsch, D. B. et al(2015),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ities",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55(1):33-60.
- Banerjee, A. V. & A. F. Newman (1993),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2):274-298.
- Baumol, W. J. (1990),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893-921.
- Berglann, H. et al(2011), "Entrepreneurship: Origins and returns", *Labour Economics* 18(2):180-193.
- Berkowitz, D. & D. N. DeJong (2005), "Entrepreneurship and post-Socialist growth",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7(1):25-46.
- Bianchi, M. & M. Bobba(2013), "Liquidity, risk, and occupational choic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0(2):491-511.
- Binder, M. & A. Coad(2013), "Life satisfaction and self-employment: A matching approach",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0(4):1009-1033.
- Blanchflower, D. G. & B. D. Meyer(1994),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young self-employed i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6(1):1-19.
- Blanchflower, D. G. & A. J. Oswald(1998), "What makes an entrepreneur?",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6(1):26-60.
- Blanchflower, D. G. (2000), "Self-employment in OECD countries", *Labour Economics* 7(5):471-505.
- Blattman, C. et al(2014), "Generating skilled self-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Ugand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2):697-752.
- Block, J. H. & M. Wagner(2010), "Necessity and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 in Germany: Characteristics and earnings differentials", *Schmalenbach Business Review* 62(2):154-174.
- Block, J. H. & A. Landgraf(2016), "Transition from part-time entrepreneurship to full-time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 of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motives",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12(1):259-282.
- Cacciottia, G. et al(2016),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fear of failure in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1(3):302-325.
- Caliendo, M. et al(2014),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ecision to become and stay self-employed",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2(4):787-814.
- Cantillon, R. (1755), *Essay on the Nature of General Commerce*, Macmillan.
- Caputo, R. & A. Dolinsky(1998), "Women's choice to pursue self-employment: The role of financial and human capital of household members",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36(3):8-17.
- Caves, R. E. (1998),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new findings on the turnover and mobility of firm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6(4):1947-1982.
- Chen, M., Y. Zhou & J. Ye (2014), "Self-employment choices of rural migrants in China: Distance and social network",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Asia Working Paper No. 31.
- Choi, N. & S. Majumdar(2013),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s an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 Opening a new avenue for systematic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9(3):363-376
- Crosan, D. C. & M. Minniti (2012), "Slipping the surly bonds: The value of autonomy in self-employ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3(2):355-365.
- Dawson, C., A. Henley & P. Latreille(2014), "Individual motives for choosing self-employment in the UK: Does region matter?", *Regional Studies* 48(5):804-822.
- Decker, D. et al(2014),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US job creation and economic dynamis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3):3-24.
- Démurger, S. & H. Xu(2011), "Return migrants: The rise of new entrepreneurs in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33(10):1847-1861.
- Djankov, S., Y. Qian, et al(2006), "Who are China's entrepreneu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2):348-352.
- Dohmen, T. et al(2012),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isk and trust attitud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9(2):645-677.
- Evans, D. S. & L. S. Leighton(1989a), "Some empirical aspects of entrepreneu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3):519-535.
- Evans, D. S. & B. Jovanovic(1989b), "An estimated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choice under liquidity constrain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4):808-827.
- Evans, D. S. & L. S. Leighton(1990), "Small business formation by unemployed and employed worker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4):319-330.
- Fairlie, R. W. & M. Lofstrom(2015), "Immigr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5298.
- Falco, P. & L. Haywood(2016), "Entrepreneurship versus joblessness: Explaining the rise in self-employ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8:245-265.
- Feldman, N. E. & J. Slemrod(2007), "Estimating tax non-compliance with evidence from unaudited tax returns", *Economic Journal* 117(518):327-352.

- Field, E. et al(2015), “Friendship at work: Can peer effects catalyze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093.
- Fölster, S. (2002), “Do lower taxes stimulate self-employment?”,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9(2):135–145.
- Freytag, A. & R. Thurik(2007), “Entrepreneurship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a cross-country setting”,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7(2):117–131.
- Fritsch, M. et al (2014), “Do entrepreneurs really earn less?”, DIW Discussion Papers 1425.
- Ghani, E. , W. R. Kerr & S. O’Connell(2014a), “Spatial 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India”, *Regional Studies* 48(6):1071–1089.
- Ghani, E. , W. R. Kerr & S. O’Connell(2014b), “Political reservations and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in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8:138–153.
- Gindling, T. H. & D. Newhouse(2014), “Self-employ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orld Development* 56:313–331.
- Giné, X. & G. Mansuri(2014), “Money or ideas? A field experiment on constraints to entrepreneurship in rural Pakistan”,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959.
- Glaeser, E. L. et al(2015), “Entrepreneurship and urban growth: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with historical min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7(2):498–520.
- Guiso, L. et al(2015), “Learning entrepreneurship from other entrepreneu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775.
- Hafer, R. W. (2013), “Entrepreneurship and state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Public Policy* 2(1):67–79.
- Hamilton, B. H. (2000), “Does entrepreneurship pa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turns to self-employ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3):604–631.
- Harding, J. & S. S. Rosenthal(2013), “Homeowner-entrepreneurs, housing capital gains and self-employment”, mimeo, Syracuse University.
- Hartog, J. et al(2010), “If you are so smart why are you not an entrepreneur? Returns to cognitive and social ability: Entrepreneurs versus employe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rategy* 19(4):947–989.
- Hu, F. (2014), “Risk attitudes and self-employment in China”,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22(3):101–120.
- Huggins, R. & P. Thompson(2015),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A network theory”,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5(1):103–128.
- Hurst, E. & A. Lusardi (2004), “Liquidity constraints, household wealth,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2):319–347.
- Hurst, E. , G. Li & B. Pugsley(2014), “Are household surveys like tax forms: Evidence from income underreporting of the self-employed”,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6(1):19–33.
- Hvide, H. K. & G. A. Panos(2014), “Risk toler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1(1):200–223.
- Hyytinen, A. et al(2013), “The return-to-entrepreneurship puzzle”, *Labour Economics* 20:57–67.
- Jacobs, G. (2008), “An occupational choice model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33(2):125–153.
- Jensen, T. L. et al(2015), “Housing collateral, credit constraints and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a mortgage reform”,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583.
- Katz, J. A. et al(2016), “Proposal for two model undergraduate curricula in entrepreneurship”,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12(2):487–506.
- Kerr, S. et al(2015), “House money and entrepreneurship”,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458.
- Koellinger, P. et al(2007), “‘I think I can, I think I can’: Overconfid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8(4):502–527.
- Koellinger, P. et al(2013), “Gender differences in entrepreneurial propensity”,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5(2):213–234.
- Kshetri, N. & N. Dholakia(2011), “Regulative institutions supporting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economies: A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Ind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9(2):110–132.
- Lafontaine, F. & K. Shaw(2016), “Serial entrepreneurship: Learning by doing?”,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4(2):217–254.
- Lafuente, E. et al(2007),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 of role models: Comparing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of rural Catalonia”, *Regional Studies* 41(6):779–796.
- Lazear, E. P. (2005),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3(4):649–680.
- Lee, S. M. & S. J. Peterson(2000), “Cultur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35(4):401–416.
- Levine, R. & Y. Rubinstein(2013), “Smart and illicit: Who becomes an entrepreneur and does it pay?”, NBER Working Paper 19276.
- Li, L. & X. Wu(2014), “Housing price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2(2):436–449.
- Liang J. , H. Wang & E. P. Lazear(2014), “Demographics

- and entrepreneurship”, NBER Working Paper 20506.
- Lindquist, M. J. et al(2015), “Why do entrepreneurial parents have entrepreneurial childre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3(2):269—296.
- Mel, S. et al(2014), “Business training and female enterprise start-up, growth, and dynamic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Sri Lank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6:199—210.
- Michaelides, M. & J. Benus(2012), “Are self-employment training programs effective? Evidence from Project GATE”, *Labour Economics* 19(5):695—705.
- Millán, J. M. et al(2013), “Determinants of job satisfaction: A European comparison of self-employed and paid employe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0(3):651—670.
- Mueller, S. L. & A. S. Thomas(2001), “Culture and entrepreneurial potential: A nine country study of locus of control and innovativenes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6(1):51—75.
- Naudé, W. (2013),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7507.
- Nguimkeu, P. (2014), “A structur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informal sector heterogenei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7:175—191.
- Parker, S. (2008), “Entrepreneurship among married coup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imultaneous probit approach”, *Labour Economics* 15(3):459—481.
- Petrova, K. (2012), “Part-time entrepreneurship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9(2):473—493.
- Poschke, M. (2013), “Who becomes an entrepreneur? Labor market prospects and occupational choice”,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37(3):693—710.
- Premand, P. et al(2016),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entry into self-employment among university graduates”, *World Development* 77:311—327.
- Rey-Martía, A. et al(2016),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9(5):1651—1655.
- Rosenthal, S. S. & A. Ross(2010), “Violent crime, entrepreneurship, and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7(1):135—149.
- Salas-Fumás, V. et al(2014), “Occupational choice, number of entrepreneurs and output: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with Spanish data”, *SERIEs* 5(1):1—24.
- Sánchez, J. C. (2013), “The impact of a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rogram on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ies and intention”,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51(3):47—465.
- Schmalz, M. C. et al(2013), “Housing collateral and entrepreneurship”,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680.
- Schmitz, J. A. (1989), “Imit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3):721—739.
- Schumpeter, J. A.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kriabikova, O. J. et al(2014), “New evid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ttitudes and self-employment”, *Labour Economics* 30:176—184.
- Tipu, S. A. A. (2016), “Comparing the behaviour of opportunity and necessity driven entrepreneu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 27(1):84—107.
- Torrini, R. (2005),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self-employment rates: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Labour Economics* 12(5):661—683.
- Valdivia, M. (2015), “Business training plus for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Short and medium-term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Peru”,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3:33—51.
- Wang, S. (2012), “Credit constraints, job mobil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a property reform in China”,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4(2):532—551.
- Yueh, L. (2009), “China’s entrepreneurs”, *World Development* 37(4):778—786.
- 李宏彬 李杏 姚先国 张海峰 张俊森, 2009:《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0期。
- 赵向阳 李海 A. Rauch, 2012:《创业活动的国家(地区)差异:文化与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管理世界》第8期。

(责任编辑:李仁贵)